

郑谦  
——  
著

中央党史研究室著名“文革”史专家倾心力作

# “文革”十八讲

# 中国是怎样 从“文革” 走向改革的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人民出版社

# 中国是怎样 从“文革” 走向改革的

郑谦——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是怎样从“文革”走向改革的 / 郑谦著. — 北京 :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6.1

ISBN 978 - 7 - 5300 - 0341 - 1

I. ①中… II. ①郑… III. ①文化大革命—文集  
IV. ①D65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20573 号

中国是怎样从“文革”走向改革的

ZHONGGUO SHI ZENYANG CONG “WENG” ZOUXIANG GAIGE DE

郑谦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120

网 址：[www.bph.com.cn](http://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28.5 印张 424 千字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00 - 0341 - 1  
定价：68.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010 - 58572393

## 目 录

### Contents

序篇 20世纪60年代的世界与中国 / 1

体制病，运动治

——观察社教运动的一个角度兼及“文革”的体制基因 / 38

“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发生 / 60

“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到《二月提纲》 / 111

中共九大前后全国的战备高潮 / 129

1970年前后国内形势的几个特点

——以1970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为例 / 146

“斗、批、改”运动与一种社会主义模式 / 162

“批林整风”运动始末 / 180

五七干校述论 / 205

一个关于平等的虚幻神话

——“文化大革命”中的招生改革 / 232

“文化大革命”中的商业改革 / 243

“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 274

“文化大革命”的巴黎公社情结 / 304

理想与空想之间

——对新中国成立后一种禁欲主义思潮的考察与思考 / 326

论“抓革命、促生产” / 344

“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体制 / 369

“文化大革命”中社会生活点滴 / 385

尾声 中国是怎样从“文革”走向改革的

——中国改革的起点与路径选择 / 430

## 序篇 20世纪60年代的世界与中国

1963年1月，毛泽东在他著名诗篇中用“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来描述当时的世界形势及他的感受。1965年5月，他在另一诗篇中又用“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抒发自己的豪情。

20世纪9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弗里德里克·杰姆逊说：60年代有段时间里几乎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这个阶段是一个普遍解放、全球能量释放的时期。在这方面，毛泽东的形象对理解这一进程是最有启发意义的<sup>①</sup>。他甚至说“毛主义乃是60年代一切伟大新兴意识形态中最丰富的思想”，在有关60年代的著作中，毛泽东的思想“朦胧无形却又无处不在，始终占据着中心”<sup>②</sup>。

2001年，法国后现代大师德里达说：“60年代发生的事，动摇、改变了世界的根基。”<sup>③</sup>

2003年《毛泽东传》作者菲力普·肖特说，对于他们这一代成长于60年代、被革命激情燃烧的欧洲人来说，遥远的中国和轰轰烈烈的“文革”让他们充满向往与理想，尽管并不清楚那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是60年代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刻下的烙印。”<sup>④</sup>

2004年7月，美国著名哲学家理查·罗蒂称，自19世纪80年代以

<sup>①</sup> 王逢振主编：《六十年代》，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页。

<sup>②</sup> 王逢振主编：《六十年代》，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

<sup>③</sup> 2001年德里达在上海的学术报告，《文汇读书周报》，2001年9月22日，第1版。

<sup>④</sup> 《我让毛在西方复活了：访〈毛泽东传〉作者》，《文汇读书周报》，2004年3月26日，第3版。

来，美国左派运动共有3次高潮。其中第三次便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sup>①</sup>。的确，60年代是一个十分奇特而又重要的时代。

6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向第二次现代化过渡，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正在进行第一次现代化，中国则刚刚开始第一次现代化。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大现代化模式都处于深刻转型（或改革）的关键时期，第三世界诸国多数正处于争取独立或确立发展模式阶段。

60年代特别是其后期，西方世界在经历战后20多年的发展和繁荣之后，普遍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动荡和经济发展迟缓。第三世界的迅速崛起震撼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革命运动不断高涨，武装斗争波澜壮阔，捷报频传。美国的侵越战争激起了全世界和平正义力量日益高涨的反战、反帝运动。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妇女运动、反传统运动愈演愈烈。“‘六十年代’是美国人权、新左（派）运动的同义语。”<sup>②</sup>以1968年震动世界的法国学生运动为代表的学生工人运动席卷多数发达国家，主要发达国家里一片激烈的造反之声，激进的造反者甚至已在具体地设想“后资本主义”的新秩序。在思想文化领域里，西方发达国家50年代初发端并盛极一时的以麦卡锡主义为代表的右翼保守主义思潮已成强弩之末，后现代主义异军突起，左翼思潮在不长的时间里席卷西方主要国家，其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在西方发达国家，由于不满“老左派”一味追随苏联的种种做法，且认为传统理论缺少解决当时西方现实问题的能力，“新左派”应运而生并不断壮大，在当时的各种社会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60年代又是社会主义阵营和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分歧和冲突公开化的时代。由于在如何看待战后资本主义制度、如何认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如何认识战争与和平等问题上分歧的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严重的争论以至分裂。1964年，苏联虽经历了领导人的不正常交替，但自50年代开始的改革仍在继续进行。至60年代末，改革的力度已大不如前，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期”

<sup>①</sup> 吴冠军、陆扬：《罗蒂：哲学风暴刮过中国》，《社会科学报》，2004年8月5日，第6版。

<sup>②</sup> [法]安琪楼·夸特罗其等：《法国1968：终结的开始》，三联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已现端倪。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后，由于苏联的压制及其自身的原因，东欧各国不思进取的保守主义上升，改革的进程明显放慢。

60年代中期，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场面和对巴黎公社精神的热情召唤，使第三世界和西方左翼热血沸腾。

总之，60年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一个激进的年代，一个激情迸发的革命年代。它是如此纷乱嘈杂，又是如此和谐统一——起码从世界现代化的进程来看。只有对这10年有一个全面、概略的掌握，才能对当时各种事件进行有意义分析；才能知道当时能做到什么，不能做到什么；才能知道什么任务是能向当时的人们提出的，什么是不能的；才能知道“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发生以及它为什么会在全世界范围内一度受到那样的追捧；才能知道70年代后的许多事情为什么会那样产生和发展。

## 动荡的西方

西方发达国家是带着巨大的成就感进入60年代的，但它们却在这10年遭受到战后前所未有的文化、社会、政治和道义冲击，带着惶惑不安和已经隐隐发作的严重经济危机进入70年代。

战后，在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推动下，继承30年代罗斯福“新政”和战时政府干预的经验，同时也借鉴苏联计划经济的成功范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实行了国家干预、福利政策、大众民主为主要内容的体制调整，对古典资本主义模式进行某种程度的修正和发展。通过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大规模干预，实行某种“混合式经济制度”，以期在市场力量与国家干预、私有制与分配正义之间建立某种平衡。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固有的经济危机和阶级冲突，适应了当代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在这种体制背景下，战后20多年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新工业革命与新发展大潮推动下，经历了一段经济、科技快速发展时期。资本主义中心

区进入经济繁荣与产业升级的新阶段，出现了大众高额消费的福利社会<sup>①</sup>。在美国，随着经济增长和消费社会的到来，在垄断资本大获其利的同时，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也大为提高，相当大一部分人分享了美国社会的富裕，中产阶级的队伍逐渐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流。这种变化是如此之大，以至有的历史学家把 1945 年至 70 年代初称为某种“黄金时期”。“这段时间的繁荣，不但是史无前例，可能也是少有的例外”，“它所造成的经济、社会、文化的惊人变迁，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巨大、最快速、最根本的”<sup>②</sup>。

正当西方当权者和垄断资本家沾沾自喜地进入 60 年代时，正当许多拘泥于“贫穷引起革命”传统观点的人理所当然地对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和革命形势感到失望时，60 年代资本主义中心区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却是另一幅图景：学生造反、工人罢工、反战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妇女运动、反体制运动烽烟滚滚，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个性解放、“垮掉的一代”等反主流文化、反正统价值观的思潮交相激荡。

1962 年 6 月，美国“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在密歇根州的休伦港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著名的《休伦港宣言》。《休伦港宣言》批评美国是一个死气沉沉的国家，它的民主是一种“没有公众的政治”，它的公民受到一种他们所不知道的力量的威胁。《休伦港宣言》对战后美国社会居于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提出了挑战，痛斥了美国社会存在的严重弊端，发出了激进改革的呼喊。它对当时几乎整整一代美国青年产生很大影响，标志着美国“新左派”组织的正式形成。

1962 年至 1963 年间，因受到当局的镇压，美国东部黑人争取进入大学平等权利的斗争愈演愈烈。1963 年 6 月 12 日密西西比州黑人领袖遇害，随即引发全国性抗议运动。“一个全国性的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斗争，正在美国的几乎每一个州和每一个城市展开，而且还在继续高涨。”<sup>③</sup> 1965 年夏季，美国的种族骚乱再次高涨，“似乎美国的每个黑人区都在造社会的反”<sup>④</sup>。

①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76 页。

② [英]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1~12 页。

③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93~494 页。

④ [美] 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商务印书馆 1988 年版，第 1494 页。

进入60年代后，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要求归还冲绳和撤除一切美国军事基地的斗争此伏彼起。1964年1月，日本人民举行的反美大示威达到高潮。这“是一次伟大的爱国运动”，“反映了日本全体人民的意志和愿望”，反映了“日本各阶层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和控制的爱国统一战线不断地扩大”<sup>①</sup>。

1964年1月，巴拿马的反美风暴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美帝国主义到处横行霸道，把它自己放在同全世界人民为敌的地位，使它自己越来越陷于孤立。”<sup>②</sup>

1965年2月7日，美国开始空袭北越，越南战争的升级引发了全球反战运动的高涨。

1965年10月中旬，在美国“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策动下，由各团体组成的“越南日委员会”发动了有几千万人参加的全国性反战活动。会议组织者在会上说，越南战争说明美国的自由主义已经腐败，除了革命似乎别无选择。会议组织者后来回忆说：1965年是美国“新左派”运动“明显放弃改良主义”，开始走向“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长征的一年<sup>③</sup>。

1966年被认为是美国“真正的嬉皮士之年”，它于1967年春夏之间达到高潮。数万反主流文化的美国青年以诸如怪诞的发型、奇异的装束、震耳欲聋的嘈杂音乐、荒唐的集会和旅行、放荡的性行为以及吸毒等“垮掉的一代”的形象，表示对权威的蔑视和对政府、对社会的反叛。他们反正统、反文化、反体制、反权威、反价值、反学校、反城市、反主流、反政府……在“一切开放，怎么都行的60年代”<sup>④</sup>，整个年轻一代似乎都处于“打倒一切”的反叛亢奋之中。

1967年起，意大利都灵、比萨、那不勒斯等城市学生反对现行大学制度的罢课演变为占领大学的风潮，到1968年已发展到频频与警察发生冲突。

1967年6月，联邦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领导的学潮，使全国许

<sup>①</sup>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9~10页。

<sup>②</sup>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sup>③</sup> 转引自刘绪贻：《战后美国史1945—1986》，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16页。

<sup>④</sup> [美]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449页。

多大学陷于瘫痪。

1967年，为抗议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发展出现的严重社会问题，日本，  
东京大学两个学院宣布无限期罢课，至1968年1月，日本已有116所大学  
先后举行罢课。是年春夏，东京大学等的学生与冲进学校的警方紧张对峙。

1968年1月底，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春节攻势震惊世界，在全球  
范围里引发了新一轮声势浩大的反战运动，美国反战示威的人数骤然增加  
3倍。

1968年1月至6月中旬，在反战运动和反种族歧视运动的推动下，美  
国共发生221起大规模游行示威，遍及101所大学，有近4万学生参加。4  
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占领学校，一些学校的学生  
在校内建立“解放区”<sup>①</sup>。

1968年4月4日，美国黑人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遭暗杀，标志着  
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非暴力战略的终结。愤怒和绝望的黑人掀起的动乱大潮  
旋即席卷美国40多座城市。“拿起枪来！”成为许多黑人本能的反应。“当  
前，世界革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美国黑人争取解放的斗争，是全  
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当代世界革命的一  
个组成部分。”<sup>②</sup>

1968年5月，发端于年初的法国学生运动迅速达到高潮。学生与警察  
的冲突不断升级，终于酿成10日的“街垒之夜”。整个巴黎烽烟四起，处  
处街垒。一位学生领袖声称：“今夜街上所发生的一切是整整一代人在反  
抗某种社会制度。”28日，总人口5000多万的法国有1000多万工人罢工，  
300多个工厂被工人占领，30多所大学被学生占领。“五月风暴”中，学  
生、工人、市民的游行队伍中高举着胡志明、格瓦拉、毛泽东的画像，赫  
然在目的还有“沿着毛泽东指引的道路前进”“再创一个巴黎公社”等大  
幅标语。在运动的高潮中，整个国家接近瘫痪，政府对局势几乎失去了控  
制，法国似乎走到了革命的边缘。“五月风暴”打碎了二战后西欧“太平  
盛世”的神话，成为1968年甚至整个60年代左翼思潮和行动高涨的形象

---

① [美]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588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87页。

标志。人们甚至已经习惯于将1968年与1789年、1793年和1871年那些不朽的革命一样相提并论。

1968年，全球学生起来闹事，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美国、法国、英国、德国、日本及墨西哥等，到社会主义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各地一片学潮。青年人对现状的愤怒与反叛，汇成一股汹涌澎湃的大潮。

1968年至1969年间，意大利都灵等地爆发了大规模工人罢工和占领工厂活动，反对雇主和右翼工会。

1969年上半年，美国学生“新左派”运动进入全盛期，300多所高等院校发生抗议示威，全国学生总数的1/3卷入运动。在华盛顿、麦迪逊和伯克利等地发生街头战斗。爆炸和纵火事件大量上升。

从60年代初起，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伴随着各种风起云涌的抗议运动，左翼政党中的激进主义开始复兴，马克思主义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不断增长。法国、美国、德国的左翼学生把“三M”——马克思、毛泽东、马尔库塞——作为精神导师。以“新左派”号召的新马克思主义运动在60年代开始声名显赫。他们把矛头指向当代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抨击美国的越战政策。60年代初创刊的《新左派评论》（英国）、《左派研究》（美国）以及法兰克福学派、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萨特的存在主义等在激进学生和知识分子中风靡一时。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九大政治报告中说：日本、西欧、北美资本主义心脏地区，爆发了空前巨大的革命运动，越来越多的人民正在觉醒。

60年代的不满和动荡从何而来？50年代富裕、冷漠的社会气氛中为什么会酝酿出如此广泛、尖锐、高涨的激进主义情怀？富裕社会中造反的基础何在？50年代“沉默的一代”为什么会被60年代“造反的一代”所取代？这些“繁荣时代最明显的受益者”为什么要反叛这个社会？有一点似乎可以明确，这些造反不是贫穷的产物，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革命和经典的劳工运动，其直接原因不在经济方面。它有新的主体，回答的是新的问题，具有新的时代特征，用传统阶级斗争理论来解释这些问题显然已经不够。

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调整形成了某种新的经济和政治格局，暂时缓和了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这种在私

有制基础上的国家干预并没有消解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它在缓解传统矛盾、改变传统危机形式的同时，又使私有制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在新的基础上积累和加深，使资本主义产生新的、更为复杂的结构性危机。例如：不断膨胀的政府开支、巨额的预算赤字、恶性通货膨胀、名目繁多的对外干预以及国家官僚机构异化所造成的难以接受的后果。60年代西方的造反风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应被视为“新政”式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产物。

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下迅速发展的经济，造成了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使处于社会底层的一部分人因不能适应对劳动力提出的更高的文化、教育和技术要求，不仅失去了就业机会，甚至失去了就业的能力和资格。在一片繁荣的经济中，他们的地位却一步步地边缘化。福利国家并没有像它所许诺的那样可以约束经济的自发力量，使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者免于危机的困扰。富裕社会中的贫困是社会矛盾进一步深化的重要表现。此外，由于在私有制基础上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之间的严重失衡，使工人阶级既无法避免经济危机的威胁，也没有得到经济发展中自己所应得到的份额。更糟糕的还在于他们不得不面对工厂里专权独断的管理机构以及机器对人奴役的整个体制。1968年“五月风暴”中工人罢工占厂运动并不仅仅是为了提高工资，正如工会领袖所说：学生的斗争是为了把民主带进校园，工人的斗争则是为了把民主带进工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50年代末至6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法国、意大利、日本、比利时等国）逐渐走向高涨的工人运动中，左翼力量相互接近，影响增加，而改良主义、工联主义的色彩则相对淡化，一些国家中共产党的影响有所扩大，左翼政党中的激进主义开始复兴<sup>①</sup>。

战后，随着经济发展和教育普及，发达国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剧增。50年代，青年学生有“沉默的一代”或“失落的一代”之称，在美国等社会里几乎听不到他们的声音。进入60年代后，随着消费社会的来临和知识经济初现端倪，人们的价值观发生着迅速的变化，这在战后出生的年轻一代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与从大萧条困境中走过来的父辈们不同，

<sup>①</sup> [英]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49页。

他们没有因三四十年代与50年代的鲜明对比而满足眼前的富裕，更不接受一种以顺从、听话为前提的富裕社会，不愿意为了物质上的富足而逆来顺受。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断加强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国家的干预、公司的专横、技术的统治和精英至上的科层制，使得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敏感地意识到发达社会对他们的压抑。他们不满资本主义教育体系，认为学校不过是整个统治机器的一部分，其目的是要把青年学生训练为服务于这部机器的律师、工程师和经理，成为企业和官僚制度的齿轮。他们要求的已不只是学习的权利，而是对学习的内容、方式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因为“大学属于学生”。“垮掉的一代”摒弃物质第一、循规蹈矩和机器时代，对资本主义的正统价值标准提出了挑战。他们不再像其前辈那样“为取胜而拼力比赛，而是向比赛规则挑战，或者干脆拒绝比赛”。总之，60年代这些不满现状者并非为贫困所迫，相反，他们是富裕和教育的产物。正如《休伦港宣言》所言：“我们是当代人，在至少是小康的环境里长大，目前住在大学校园里，正忐忑不安地注视着我们所继承的世界。”<sup>①</sup>

国内的“新政”和繁荣没有改变帝国主义的本性，它们在国际上仍然奉行老殖民主义者的“丛林法则”。60年代法国的阿尔及利亚战争特别是美国的越南战争，招致了世界范围内一浪高过一浪的反战运动。新帝国主义处处受到挑战和抵抗，美国往往成为“邪恶帝国”同义语。反战运动成为其他各种工人运动、左翼运动、抗议运动的催化剂，大大刺激了左派势力的发展。年轻的知识阶层由战争的非正义性推断出政府的非道德性和虚伪，继而发展到怀疑创造了战后繁荣的资本主义的合法性。“越南战争是新左派得以发展的最重要因素。”<sup>②</sup> 1968年初，德国学生领袖号召把反战与反抗欧洲阶级统治的斗争联系起来，“在所有公共机构内进行长征”，“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建立反机构的解放区，它相当于中国共产党人在长征期间敌后游击队的解放区”<sup>③</sup>。奉行“丛林法则”的帝国主义使自己置身于

<sup>①</sup> [美]戴安娜·拉维奇选编：《美国读本》下，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524页。

<sup>②</sup> [美]A.拉波鲍特：《工业社会和新左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6页。

<sup>③</sup> [美]A.拉波鲍特：《工业社会和新左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3页。

全世界人民丛林般高举的抗议的手臂中。反战运动使政府权威和精英政治受到严重挑战，成为引发国内政治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并蔓延到其他发达国家。

与自由资本主义相比，国家干预突出了国家、行政权力的作用。通过行政权力对财富进行再分配，虽然缓和了社会劳动领域的阶级冲突，但它必然扩大官僚机构的权力及这种权力调节的范围，导致国家官僚体制的巨大扩张和政治决策过程非民主化。这样，资本主义在仍然保持“一切异化的根源”——劳动异化——的基础上，又多出了被韦伯称为社会生活官僚主义化——即政治异化——的现代性病症。哈贝马斯把马克思批判的社会金钱化和韦伯所论述的社会官僚化结合在一起，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们受到了劳动异化与权力异化的双重压迫。他甚至认为，这种由权力导致的异化，比劳动异化更具有普遍性和危害性。换句话说，与官僚制导致的异化相比，劳动异化不再具有直接的政治冲击力。

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既有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又不断产生着一些诸如人的异化、贫富差距、环境和自然资源破坏、家庭和伦理等严重问题。身处发达国家的左翼理论家敏锐地感觉到了这些问题。马尔库塞指出，消费社会有着充裕的物质和先进的技术装备来化解和吸纳不满情绪，用更加成熟的方法来控制社会个体，人们被操纵消费者爱好的人所奴役。工业社会通过高度浪费性的生产和消费，把不属于人的本性的物质需求和享受无限度地刺激起来，从而有效地窒息了人类解放的真正需要，瓦解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不满。当人们为商品拜物教所支配，麻木不仁地去做那些并非真正必要的工作，他们也就成为物质的附庸而日趋畸形化，成为“单向度的人”<sup>①</sup>。另一方面，随着科技发展而日益膨胀起来的见物不见人的文化，又使“技术统治”、拜金主义、纵欲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反理性主义等等恶性发展，资本主义的“非人性”“非道德性”“非理性”的一面也日益引起人们的不安，引发对科技文明的工具理性与现代性进行深刻反省。

“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特征的第一次现代化，在 20 世纪 50 至 60 年代

---

<sup>①</sup> 详见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重庆出版社 1988 年版。

出现高潮，发达国家先后完成第一次现代化进程，发展中国家纷纷投入现代化的洪流。”<sup>①</sup>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现代化的转型往往又与发展模式转型相交织，这应当被看作是60年代西方国家中的种种问题产生的基本原因。发达国家经过战后20多年的迅速发展，到60年代先后完成第一次现代化，并开始或酝酿第二次现代化；战后国家干预式的改革与经济景气虽然使当代资本主义大不同于古典资本主义，但其基本矛盾却一仍其旧，60年代种种激烈的社会运动便是这种老矛盾内在冲突的新表现。

总之，对于发达资本主义来说，60年代是一个激烈动荡的多事之秋。新老殖民主义在全球进一步溃败，国家干预回天乏术，“黄金时代”难以继，新经济危机的阴霾日渐浓重，左翼思潮和力量雄风正盛，新自由主义却已跃跃欲试，资本主义中心区又面临着一次在深度和广度上与罗斯福“新政”类似——只是内容十分不同——的转变。

60年代西方世界的动荡和冲突，更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影响力，强化了社会主义平等理想的号召力，突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迫切性。它可能产生的另一个后果，是弱化了社会主义改革的紧迫感。

## 崛起的第三世界

1960年，非洲有17个国家获得独立，该年因此被称为“非洲年”，而这仅仅是60年代世界民族解放高潮的前奏。对第三世界来说，60年代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革命运动高涨的年代。武装起义、游击战争、军事政变、外国干涉、血腥杀戮、政治动荡成为这10年的鲜明标记。在50年代的基础上，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在60年代达到了20世纪的最高潮，基本上完成了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使命。

5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在以美苏为首的北约与华约两大军事集团紧张对峙的同时，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不断高涨，出现了世界性的反帝反

---

<sup>①</sup> 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著：《中国现代化报告2003——现代化理论、进程与展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殖浪潮。重要的是，此时的民族解放运动已看不到多少“非暴力抵抗”的影响，武装斗争、游击战成为主要的斗争形式。民族解放战士使用简陋的武器甚至原始的长矛、弓箭与掌握现代化武器的新老殖民主义者殊死战斗。“赤道雕弓能射虎，椰林匕首敢屠龙”<sup>①</sup>，“一座座火山爆发，一顶顶王冠落地”就是这种斗争的写照。在如火如荼的人民战争中，老殖民主义体系迅速瓦解，亚非拉新独立国家的阵营日益扩大。

如果说 1955 年亚非会议的召开是亚非国家觉醒的第一个里程碑，那么 1961 年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第一次会议的召开，则标志着不结盟运动正式形成，成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独立的第二个里程碑。1964 年七十七国集团的成立，有力地推动着不结盟运动发展，使之成为独立于超级大国对抗之外的“第三种势力”，在推动民族解放运动、反对大国霸权主义、建立世界新秩序等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这是第三世界形成和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1970 年有 54 个国家参加的第三届不结盟国家及政府首脑在卢萨卡最高级会议上通过的《卢萨卡宣言》中，批评、谴责超级大国对别国的干涉、颠覆，强烈呼吁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标志着不结盟运动日益走向成熟。从总体上看，对于第三世界来说，60 年代的确是一个解放的年代，胜利的年代，一个“东风压倒西风”的年代，一个革命与战争的年代。而对于帝国主义来说，则是输掉了战争，输掉了人心，输掉了道义。而苏联则往往由于其霸权主义、与美国的妥协而受到第三世界激进派的指责。

60 年代第三世界风起云涌的斗争，反过来冲击着西方，是整个世界左翼思潮高涨的重要原因，以至一些西方左派认为 60 年代的起点并不在西方，而在第三世界。杰姆逊说，第三世界历史对第一世界 60 年代的发展有着某种特殊的影响力，最能表现第一世界 60 年代典型特征的许多事件都与第三世界密切相关。例如，涌现出声势最为浩大的学生运动的两个发达国家——美国与法国，都是因为它们身陷殖民战争之中。60 年代发达国家的激进运动无一例外地从第三世界斗争中汲取激情和灵感。在他们的集会和游行队伍中，经常可以看到毛泽东、胡志明、格瓦拉的大幅画像，听到高

① 叶剑英诗。

喊“胡”“切”的声音。当时，在法国一些左翼知识分子中流行着一句话：“在法国，你可以批评总统，却不能批评毛泽东。”<sup>①</sup>此外，A. 德利克则意味深长地提醒人们，“文化大革命”和第三世界的独立是同时出现的。

民族国家首要任务是争取独立，接下来要解决的便是对发展模式的选择，而这种选择同样对帝国主义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当时，虽然多数新独立国家选择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西式），但也有一些在历史传统、宗教信仰、发展程度、行动纲领等各方面十分不同的民族国家，如智利、叙利亚、利比亚、阿尔及利亚、伊拉克、马里、加纳、坦桑尼亚、斯里兰卡、印度以及巴基斯坦等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或类似的激进主义发展道路（苏式或类似苏式），起码自称是社会主义。

这些新兴国家选择或钟情于社会主义不是偶然的。这不仅反映了东西方冷战对峙下“非此即彼”式的判断，反映了落后国家人民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憎恶，反映了经过社会革命或解放战争取得独立地位的特殊经历，也反映了他们希望通过社会主义以避免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利润动机所必然带来的贫富差别、社会不公及道德堕落，以及希望争取更多社会正义的强烈愿望。战后不断高涨的反帝反殖运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示范效应及其在平等、正义等方面的感召力，后发国家客观上必须突出国家主导计划型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不能不使社会主义模式对第三世界国家的领袖和人民产生巨大的吸引力。

所有这些也应被看作是60年代的产物。

在这些国家中，不论是武装夺取政权还是实行激进社会主义改造、建设都堪称典型的是古巴。古巴于1959年武装夺取政权并于1960年宣布奉行马克思主义并转向社会主义后，紧接着激进快速地实行了高度国有化的改造，推行高速工业化战略，强调非物质的精神鼓励。1966年秋开始取消奖金和加班费，实行主要依靠精神鼓励的方针，认为这样能缩短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间<sup>②</sup>。急于过渡和生产跃进在1968年达到高潮。1968年3月

<sup>①</sup> [http://blog.sina.com.cn/s/articelist\\_1910596964\\_0\\_1.html](http://blog.sina.com.cn/s/articelist_1910596964_0_1.html)

<sup>②</sup> [美]海伦·德斯福瑟斯等编：《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8~62页。